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文学论丛/褚孝泉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309 - 03109 - 1

I. 外... II. 褚...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
②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①H0 - 53②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630 号

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褚孝泉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 序..... 陆谷孙(1)
- 韩礼德对转换生成语言学若干观点和我的看法 ... 朱永生(1)
- 视觉隐喻管窥..... 熊学亮(12)
- 代词在 C-统制域内的照应 徐 蔚(23)
- 宏观结构对意义关系的启示 王全智(38)
- 经济原则对语句的语义结构与概念结构不对称
现象的解释..... 蒋 勇(52)
- 交际效果越强越好原则与语言创新倾向
——从语言使用者角度谈语言创新..... 王馥芳(63)
- 语域研究新视角..... 汪少华(73)
- 作为批评家的王尔德..... 谈瀛洲(83)
- “客观关联物”与“拟容取心”..... 汪洪章(91)
- 略论日本存在文学..... 邹 波(101)
- 中英诗歌中“杜鹃鸟”的意象..... 孙 钢(108)
- The Search for Self and Place within the
Community in Toni Morrison's *Sula* 朱建新(118)
- 不可能的婚姻或婚姻革命
——浅论《无名的裘德》和《春明外史》的
女主人公 张素琴 张 轶(128)
- 自我与上帝之间
——艾米莉·狄金森的宗教困惑和

探索	张立芹 张 轶(136)
看得见的女人	
——介绍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	
格洛丽亚·内勒	宿玉村(146)
直面人生的快乐勇士	
——艾伦·马歇尔	胡 健(157)
佛像的启示	
——评品特《看管人》中佛像的内涵	查 莉(165)
差异在第五维度	
——中西文化对比初议	朱 静(172)
文化交流中文化的差异与人性的共通	韩 佳(182)
《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趣笔处理	王 颖(192)
文学翻译家 = ? + ? + ?	王滨滨(203)
汉语中的词语重复现象及其翻译	蔡基刚(211)
翻译与中西文化磨合	孙 靖(224)
文学翻译中的“预设读者”	谭 渊(231)
无益的膨胀 费解的疏漏	
——评《新英汉小词典》修订版的失误	俞惠中(240)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to an	
Ongoing Testbook Project	沈 黎 王 颖(257)
TEFL 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及其教学启示	赵 蓉(274)
浅谈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翻译教学(修改篇)	陶友兰(284)
大学英语教师的英语课外学习策略	吴晓真(294)
Classroom Discourse Analysis	陈洁倩(302)

浅谈语用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刘亦春(320)
A Brief Analysi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Chinese EFL Students' Writing ·····	陈春胜(330)
德语动词的名词化表达·····	徐龙顺(347)
汉语“拈连法”和德语 Zeugma 的修辞特征 ·····	夏正标(351)
“儿”和“夕”的对立 ——浅析日语中的时态关系·····	朱 琰(360)
读解《敬语表现》·····	黄小丽(374)
汉韩状态持续和行为持续表现形式对比研究·····	金钟太(382)
现代俄语构词模式的能产性和词汇的派生意义·····	刘松筠(391)
俄、汉成语、谚语的文化摄入及美学探析·····	李 静(399)

序

陆谷孙

搜辑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大多出诸复旦大学外文系和大学英语部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之手，共计 39 篇，分列于语言学、文学、翻译、教学法等类目之下。

毋庸讳言，不少作者宁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校外的所谓核心期刊上去，以利晋级或硕士、博士学位的取得。只因外面的学术话语空间太为狭窄，除非有重量级大人物推毂，外人难以打入；更有少数商业头脑特别发达的编辑，要视作者承诺支付的“赞助费”多少来决定稿件的录用与否。我的观感有限，决不敢以偏概全，但是学界的市侩化趋势，怕是大多数人有目共睹的。

鉴于 publish or perish 的严峻形势，著文发表为急。于是，我们的中青年同仁在系领导的关怀之下，并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慷慨帮助，自己开辟了这么一片学术话语的园地。这个集子已是 5 年中的第三本了。集子里的文章当然并非篇篇都是谔谔高论，但以本人的简陋品尝之，实也不无佳品。读者若学长康啖蔗，相信是会读出些滋味来的。

其实，若干年前，我们这儿也曾办过一份刊物，其前身且可上溯到万马齐喑的“文革”后期。可叹人事变迁，终始不易，停刊之后想再续当年之盛，今天光是申请一个刊号，就是够难的了。

有文化知识的人，总要写文章，这恐怕可算一条人间铁则。写了文章，总要给人看，把自己的观点公布于世，或觅知音，或求质

疑,或者——野心更大一些——建立一种所谓话语霸权,因而要找地方发表,乃是人之常情;而编辑或出版商出于种种原因,看不上你的文稿,做事周到一些的给你发一封退稿信,作派颇有大家风范的则任你的大文如泥牛入海,让你独去咀嚼退稿的酸楚。谓予不信,诸位可读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若嫌伦敦离你我太远太久,且以鄙人为例如何?我在改革开放之初某刊创办之处,曾投去一篇题为《权当惊世狂言如何?》的稿子,提议翻译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不但稿被枪毙,据说还被责为替西方反动作品张目。时隔不到十年,董乐山兄不是把这本书译出来了吗?我又写过一篇叫作《俯仰之间,不谄不媚》的文章,因为批评了某位写回忆录而红极一时的遗孀,遭某报退稿。我偏不气馁,改换门庭而终于中鹄。由此可见,对退稿的事,宜早有思想准备,决不因碰壁一两两次或四五次而善罢甘休。

话说回来了,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第一位依据应是知识至高无上的自怡性。人在有些时候从事写作,未必非求发表不可,倒是为了梳理思想,记录观感,抒发情怀,宣泄心志,以满足表达欲为主。我在“文革”期间曾译过一小部分《吕蓓卡》,除本人以外再无第二名读者,又曾在一架破旧的打字机上埋头苦干数周,打出一份共26页题为《孤燕》(*Solitary Swallows*)的英文文章(“孤燕”云云,一为表示“不蘄人知”的意思,二在借用 *One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 的英谚,表示文中搜集的有些资料可能是孤例,未见得就能代表一般),原为备忘加自娱,后来,好友任治稷兄(原外文系同仁,现定居美国)和已故葛传槩先生索去一读,这才算有了两位读者!

写作实际上是非常美妙的智力活动,写作中可见性灵、机趣、玄悟、哲理、兴会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减少泡沫,充实内质。要是年富力强,却涣散精神,流连闹汨,从来不写一篇文章,那就很难说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了;另一方面动

辄抨击前人以自表^裸，或蹈袭依傍，皮附欧美而矜夸，虽则表现不一，鄙陋之心却同。

但愿由我们自己奋力开辟的这一方话语空间容纳可久可大的真学问，引起各级学术判官的注意和重视；但愿外文系和大学英语部的青年才俊发扬踔厉，竿头日上。谨以“米汤大全中物”（钱钟书先生对序跋类社交应酬文字的晒称）表达区区衷情如上。

韩礼德对转换生成语言学 若干观点和方法的看法

朱永生

一、引 言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语言学流派。相对而言,在过去的40年中,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声势和影响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在过去的20年中,形势发生了变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地位逐步上升,转换生成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本文的重点是论述韩礼德对转换生成语言学若干观点和方法的看法。

二、如何看待“理想化”

韩礼德(1978)明确指出,“在任何一种语言研究或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研究中,都含有理想化的成分。关键是我们需要尽可能地

将理想化的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我们了解交际的过程”。韩礼德认为,乔姆斯基的理论过于理想化,牺牲太大,放弃了许多不应该放弃的东西。他(1973)主张语言理论应该接近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况,指出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取决于对真实使用的语言所作的研究,甚至当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这种研究时,与语言行为相关的各种特征有可能恰恰就是最容易被理想化过程抹杀的那些特征。”

在《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角度》(*Aims and Perspectives in Linguistics*)一书中,韩礼德(1977)再次就乔姆斯基“理想化”的做法发表评论。他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儿童是在一种与周围环境完全隔绝的条件下学习语言的”,“语言理论因此把社会情景及各种社会现象都排斥在外”,这就意味着“排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语义的交换”。韩礼德明确指出,“理想化就是心理化”。他认为,在语义与现实之间还有社会结构存在,而乔姆斯基把语言理想化,实际上就是有意回避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韩礼德看来,人们既可以把语言使用看作是个人内在的行为(*intra-action*),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既可以通过研究个人的知识(*knowledge*)来解释互动,也可以通过研究互动来解释知识。据我们所知,这是韩礼德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论述乔姆斯基所说的知识与他本人所说的互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韩礼德对乔姆斯基“理想化”所作的最近一次批评出现在1998年写成但至今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题为“*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他的原话是:“Of course, we, as grammarians, had to learn to write our descriptions in computable form; that is, to make them fully explicit. This was an important exercise, from which we learnt a great deal. But to make them explicit is not the same demand as to make them

simple. Language is not simple. It is ferociously complex —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complex phenomenon in nature; and at least the general label ‘constituency’ is not a single, undifferentiated type of structure (like a ‘tree’), but a highly variable array of different meaning — making resources with highly complex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m. Unfortunately the linguists themselves had made the problem worse: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at least in America, but also perhaps in western Europe and in Japan, was the structuralist one deriving out of Bloomfield via Chomsky; and this was highly reductionist, in that, in order for natural language to be represented as a formal system, much of the rich variation in meaning had to be idealized out of the picture. But not only was it reductionist — it was also authoritarian: for linguists of this persuasion, the standard response to anyone who disagreed with them was, ‘Either your grammar is notational variant of my grammar, or else your grammar is wrong.’”从这段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韩礼德不仅坚决反对“理想化”的思想和做法,而且对乔姆斯基学派惟我独尊的傲慢态度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三、如何看待“形式化”

我们在上文指出,乔姆斯基把语言视为一整套规则,认为使用者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则,便能创造出无数符合语法的句子。他主张语言描写形式化,规则描写科学化。而韩礼德首先肯定“形式化”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指出语言的实际使用不是仅靠几条规则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言语活动参与者、交际的话题、场合、方式及目的等。在韩礼德看来,要真正反映语

言使用的实际,语言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语言使用的倾向或盖然性(probability),即最为常见的交际模式。

我国学者申小龙(1988: 234)对以转换生成语言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脱离语言实际研究语言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既然语言是人和世界相遇的中心点,那么语言的社会性、人文性才是语言的本质,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抽象化的同时舍弃了语言在人文方面的根本属性,这使得它无法贴近语言现实,更无法深入语言的本质层次。它的解释力必然是极其有限的。诚然,形式化描写具有明晰、规范、细致、严密的无可否认的优点,这对于语言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对它的限度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将它异化为一种语言的本质,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语言。归根结底,我们难道是在找到了一种描写语言能力的理论或规则形式系统之后才对人类掌握自然语言这种能力有所理解的吗?还是我们只有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才用理论和形式系统对它作出一定的解释?”申小龙不是韩礼德的门生,也说不上是韩礼德的忠实追随者,但他的上述观点的确以客观的态度指出了乔姆斯基“形式化”的局限性。

廖秋忠(1996: 280—281)在一篇比较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文章中,对这两个学派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作了精辟的论述:“形式主义除了在描写时强调形式化之外,还强调语言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功能主义并不排斥描写的形式化,但强调语言结构对功能等因素的依赖性。虽然绝大多数的语言结构就其产生的原因来看可能是出于功能上的考虑,但功能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就共时的角度来看,原来的功能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可能已不明显或看不出来,人们已无法从语言的功能推导到语言的结构形式。因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出发,语言的形式结构是可以单独研究的,只是在研究时不要过分强调语言结构的自主性而否认形式与功能之间的联系或否认功能的解释是一种

可能的解释。反过来说,功能主义者也要看到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相对独立的一面,不要一味夸大功能对形式所起的必然作用,从而使得功能的解释变得无所不能而无所能。这两种研究观点的学者们应看到他们的研究之间的互补性而不应相互排斥。”在我们看来,廖秋忠的这番话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

四、如何看待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

众所周知,乔姆斯基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而韩礼德区分“能做”和“做”,前者指的是“语义潜能”,即语言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后者指的是对语义潜能的实际应用,即语义的具体表达。由于乔姆斯基和韩礼德分别从心理和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语言能力”和“可能做”不是一回事。前者指的是讲话者主观拥有的语言知识,后者指的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所有意义。

乔姆斯基区分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区分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知识”,并把语言能力的研究看作是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在谈到应当如何看待乔姆斯基有关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区分时,韩礼德(1978: 38)说,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接受这种区分,但研究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知识,建立一套能解释各种实际语言应用情形的“语言能力理论”,这就是说,你在承认有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承认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存在;第二种方法是彻底摒弃这种区分,换言之,对符合语法的(grammaral)语言现象和可以被接受的(acceptable)语言现象加以区分。韩礼德(1973)认为,功能语言学没有必要去研究讲话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坚持在讲话者所知道的和讲话者实际所做的之间划一条界线,我们就无法对讲话者所做的作出解释,只能使它看上去仅仅是从讲话者的语言知识中随意选择而得出的结果。”他(1978)还指出,如果一定要使用“语

言能力”这个术语，就必须把它理解为“讲话者所具有的任何使用语言的知识”。

看到这一致命弱点的不仅韩礼德一人。美国的马提索夫(J. A. Matisoff)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语言学家关心得更多的是如何使表述漂亮、精确，具有数学的严密性，而实际上不能忠实于所研究语言的精神实质，有时候语言材料是庞杂的，不规则的，或不匀称的，而生成语法又试图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像数学那样精确。任何现象都有各种各样的例外。”

在我们看来，由于乔姆斯基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可以绝对形式化的现象，他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就不可能是全面的，也不可能是穷尽的。

五、如何看待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

乔姆斯基对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位置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前后不一致的。他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这本书中明确指出：“语法是独立发挥作用，不依靠意义的”。这种“语法独立论”实质上是把语法视为纯形式的东西。他把意义比作头发的颜色，认为研究语法不需要研究意义，就像研究语法不需要了解讲话者头发颜色一样。他这种观点不久便遭到反对，反对者中有的他的学生。卡茨(Katz)、雷科夫(G. Lakoff)、福德(Fodor)、波斯特尔(P. M. Postal)、麦考利(J. D. McCawley)、罗斯(J. R. Ross)和巴赫(E. Bach)等人认为，语义必须包括在语言学之中，研究语言不考虑语义就如同研究牛奶可以不考虑奶牛一样站不住脚。

乔姆斯基本人也发现他建立的语法规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句子结构，从而感到以前的观点过于绝对，应该进行修正。从《句法理论面面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修正。乔姆斯基(1965)明白无误地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作出句法考虑和意义考虑可以截然分开的假设。”他不再坚持语法独立的观点，不再认为先由句法生成深层结构，然后由深层结构进入意义，而是认为语法和意义共同发挥作用了。

韩礼德像其他所有功能主义语言学家一样，始终把语义研究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乔姆斯基等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忽视语义研究甚至摒弃语义研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六、如何看待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语言

众所周知，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许多语言学家主张从心理和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生成和理解过程。对这个问题，韩礼德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方法，但并不一味反对，更不干涉别人这样做。他这种态度不仅反映在他对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想法上，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人，其中除了福塞特这样的把心理因素纳入语言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之外，还包括海姆斯(D. Hymes)这样的既从社会角度又从心理角度研究语言的非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礼德不同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基本是采取宽容态度的。

这里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我们说韩礼德不一味反对别人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各种语言现象，但这并不是说韩礼德支持乔姆斯基把语言完全看成“机体内部”的现象。我们知道，从索绪尔开始，对于“语言在哪里？——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这个问题，语言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显然，乔姆斯基是主张从人体内部即从心理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而韩礼德是主张从人体外部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在这一点上，韩礼德的观点始终是十分明确的，可以

说从来没有改变过。比较强烈的一次表态出现在他 1977 年出版的《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角度》一书中。在这本书中,韩礼德指出,“人文科学不是内省的同义词”,“近年来,理论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内部作用上,排斥相互作用。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给语言系统的描写带来了一种特别的结果:语言使用的环境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被看作是一种静止的被动的因素。环境被当作为解释语义而提供的一种带有装饰性的背景,而不是被看作语言使用过程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动态成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韩礼德第一次承认,语言研究不能以人类的皮肤为界,要么只研究皮肤里面发生的现象和过程,即人类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要么只研究皮肤外面发生的现象和过程,即人类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社会过程。他明确指出,研究语言,不仅要研究人的内部作用或人的知识,也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人的行为,从而论述了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下面是韩礼德本人用来说明这一观点而绘制的图表,从这份图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内部作用和相互作用所要研究的不同内容,又能看到乔姆斯基使用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这一对术语与韩礼德使用的“能做”(can do)和“做”(does)这一对术语之间的关系:

	System	Instance
Interaction (behavior)	behavior potential ("can do")	instantial behavior ("does") (= "performance")
Introaction (knowledge)	knowledge potential ("knows, i.e. can bring to consciousness") (= "competence")	instantial knowledge ("brings to consciousness")

七、结 语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韩礼德在语言性质、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上与转换生成学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需要指出的是,近 20 年来,两个学派中都有人接受或部分接受对方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使两个学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系统功能语法这一方,较早转向而且转得比较彻底的是赫德森(R. A. Hudson)。另一位骨干是福塞特(R. Fawcett),他在 20 年前也开始把心理认知因素纳入自己的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去。在转换生成语法这一方,菲尔莫尔(C. Fillmore)的“格语法”对句子成分的格所作的分析与韩礼德对句子成分语法功能的分析相当接近。此外,还有一些人已经可以归入功能学派,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方法研究句子结构内各种成分所发挥的功能(D. Crystal, 1987: 409)。但是,两派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宽。

尽管许多人都希望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家能坐到一起,交换意见,论长道短,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除了学术观点本身差异很大之外,两派之间长期缺乏直接的沟通,也为双方的对话造成了难以跨越的人为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很难看到互相接近的迹象。

参 考 书 目

Berry, M. (1977a)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Linguistics: I, structures and*